



本书责编：何志华
封面设计：陈世五
版面设计：盛寄萍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第一批50种)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印刷一厂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巴蜀印刷厂

1990年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 套

ISBN 7-80523-357-8/Z·27
定价：(50种) 130.00 元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主 编

章培恒 安平秋 马樟根

编 委

(均按姓氏笔划多少排列)

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章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曹丕庄

(以上为常务编委)

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立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	

(以上为编委)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

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为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战国策》又称《国策》。它是我国战国时代的一部资料汇编，相传是由当时各国史官或策士们辑录的。历代图书著录家们对这部书的性质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史书，把它列入史部杂史类；也有的认为它是子书，把它列入子部纵横家类。

纵观《战国策》全书，它的内容主要是记载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们在游说列国时所提出的有关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主张和策略，以及它们游说活动的情况和过程。书中充满了雄辩的论述和辩难，构成了一个个权变、阴谋的故事。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些言行、故事大多是虚构或夸张的，既缺乏明确的时间记载，又多与史实有出入，难以成为一部信史。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战

《国策》是一部史书，毋宁说它是一部具有文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或历史散文集。

《战国策》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它最初是由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根据历史资料加以整理而编订的。据刘向《战国策书录》记述，当他奉汉成帝之命整理皇家藏书时，发现了一批散乱的战国资料，共七种，书名分别叫做《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另有八篇是按国分编的。这批资料内容相近，但重复错乱，编排无序，字多误脱，也没有作者姓名。刘向进行整理时，用“国别”的体例，把上述六种资料分别编入各国名下，尽可能照顾了时间顺序，剔除了重复的内容，重新编为一书。由于该书所写的内容都是有关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事情，故定名为《战国策》。

刘向编订的这部书，后来称作古本《战国策》，共三十三篇。东汉高诱为它作了注，很可能是和刘向本相并行的。到了宋代，这两种本子都已散佚甚多。曾巩（1019—1083）奉命编校史馆书籍时，古本就已缺失了十一篇。曾巩进行了一番寻访、搜求之后，才补足了古本三十三篇的规模，而高注本仍然缺失大半。可见曾巩本恐怕已不全是古本《战国

策》的原貌了。

南宋姚宏按照曾巩本的篇次，参照诸家校本，重新加以校勘，并在高诱注的基础上作了续注，与他同时的鲍彪却按国别和各国世系将曾巩本的篇次重新加以调整，并全部作了新注。元代中期的吴师道又在鲍彪本的基础上加以校勘和补正。此后，《战国策》便基本上按照姚、鲍两个版本的系统流传下来了。明清以来，研究《战国策》的学者甚多，各种校勘、注释、评析之类的选本、校本、注本、评本大量涌现，其中清人黄丕烈的刊本和《札记》三卷尤为后人所称颂。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姚宏本为底本，综合历代重要刊本，出版了《战国策》汇校汇注本。一九八五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不仅详尽地汇集了前人校注、考释的研究成果，而且多下己意，并附录了大量的有关序跋、著录、评论、佚文及索引等资料，给研读《战国策》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战国策》最初的作者是谁，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刘向所见到的原始资料中并无作者署名，所以这个问题就成了千古之谜。历代的研究者只能作一些推测，至今尚无定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战国策》产生的时代背景上来作一番考察。

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形成的大变革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及各国发展的不平衡，各个诸侯国都想扩大自己的领土，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于是就进一步加剧了自春秋以来就开始的相互争夺的兼并战争。“争城一战，杀人盈城；争地一战，杀人盈野”，其激烈的程度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况下，各国之间时而相互利用，互相联合，时而你争我夺，征战不休，形成了“邦无定交”的局面。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急需得力的人才为自己服务，因而原来“世卿世禄”的用人制度就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了，代之而起的是各国君主的争相招贤纳士。他们不惜用高官厚禄来招揽为自己服务的有智人才，于是“士”这个阶层的人们也就随着活跃起来了。一些具有各种才智的人，为了取得高官厚禄，风尘仆仆，四处奔走，从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出发，揣摩天下形势和各国君主心理，游说各国诸侯，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斗争策谋和外交才干，以求得各国君主的赏识和重用，以至成为他们的谋臣和策士。这些人士，依附于各国君主，并和统治者相互为用，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其地位当然也就大大提高了。他们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以至左右天下形势，就更加推波助澜

地促进了这个时代的兼并和征战，对一些原来在位的将相、卿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使他们的言论、行动也就越来越加显示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游说之风、养士之风以及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是这样形成的。有关他们的言论、策谋，当时各国的史官必然都有所记载，这就自然产生了许许多多片断、零散的史料。这就是刘向整理皇家图书时所以能够看到各种名目不同、遗存散乱材料的原因了。

游说诸侯，既需要广博的知识，能说善辩的口才，还需要善于揣摩对方心理、随机应变、以投时君所好的机智。因此，它受到了当时以及以后许多知识分子的爱好，甚至把这种“纵横长短之术”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于是，把游说之士的言行、传闻以及各国的有关史料加以传抄，并在传抄中加以再加工、再创造，从而作为自己学习经验、模仿技巧的参考或范本，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这些材料，迭经传抄或加工，在官方或民间都会有所收藏，而且抄本颇多，绝不止一种或两种。据《史记》所述，产生于战国时代的纵横长短之术，不仅为一般士人所好，就连一些知名的儒家、法家人物，也把它当作仕进的阶梯。这种“尚游说”的风气，一直到西汉初期还很盛行，象蒯通、主父偃、邹阳、

韩信等人都是深好此术的。这些爱好者们参与了有关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编写，当然也是很可能的事。由此可以推断，从战国至秦、汉之间，有关纵横长短之术的记载材料是很丰富的。其间，秦始皇虽曾焚书坑儒，但有关纵横之学的书籍和人士是不在打击对象之内的，而且即使“焚”过、“坑”过，也是“焚”不尽、“坑”不完的。汉初建秘府，搜集图籍，广开藏书之路，所以官方才会藏有刘向所能看到的几种本子。由于这些材料出自不同的作者和地区，再加上流传年代的久远，抄本不断的佚失或出现错乱，那也是很自然的，所以刘向所见竟是那般混乱。出于同样的原因，古本和现今流传的本子，也会有很多差异之处。因此，学者们一般认为《战国策》既不是一人之作，也不是一时一地之作，是正确的。

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的考古发现，对研究《战国策》这部书的性质、作者和成书过程等问题都有很大的帮助。该墓出土的帛书共有二十七章，约一万一千多字，是与《战国策》同类性质的文字，现已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六章与《战国策》、《史记》完全一样，有两章见于《史记》而不见于《战国策》，有两章见于《战国策》而不见于《史记》，还有两章仅部分地

见于《战国策》，其余的十六、七章当是刘向和司马迁都不曾见到过的“逸书”。该墓墓主是西汉初轅侯的儿子，轅侯是当时长沙王相，并且是一位“纵横长短之术”的爱好者，所以他的儿子墓中藏有家传的此类材料。可见，这些帛书应该是西汉初期所流行的“纵横长短之学”抄本的一种。由此可以推断，刘向在整理、编定《战国策》时所见到的原始材料，只能是同类材料的一部分，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所依据的材料，自然与刘向所见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可能刘向整理的《战国策》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策》有所出入，曾巩所整理的《战国策》又未能完全恢复古本的原貌，那么战国时代的谋臣策士的言行材料，更会有很多已经佚失，致使我们今天看不到了。

今本《战国策》共三十三卷，分为十二个国别。其中，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姚宏本分为四百八十六章；鲍彪本分为四百九十四章；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校汇注本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由于绝大部分篇章缺乏明确的时间记载，后来不少学者对此专门做了一些编年、考释工作，但仍没能完全排列出令人信服的统一史实时次来，还有

待于今后进一步地考辨和探讨。

《战国策》虽然不是一部信史，但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书中除了忠于史实，可直接作为史料的部分篇章外，其余篇章也都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它的作者们毕竟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所以这部作品就能从不同角度上反映出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十分复杂尖锐，特别是战国后期，诸侯间时而罢兵修好，时而背盟攻伐，尔虞我诈，战祸连年；一些谋臣、策士、纵横家之流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更加翻云覆雨，推波助澜，致使百姓们在这混乱的社会中离乡背井、葬身沟壑，生活涂炭，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在《战国策》中，许多篇章把这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得生动而具体，给读者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因此，《战国策》可以说是一部形象化的战国史。

《战国策》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它的许多篇章还深刻地揭露和鞭笞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和罪恶，对广大人民的灾难和痛苦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和愤慨。书中描绘的统治者，既互相争夺、残杀，又互相勾结、利用，反复无常，不讲信义。他们有的骄横跋扈，贪婪狠毒；有的圆滑伪善，阴险毒辣。为了自身利益，他们挑起战争，横

征暴敛，不惜向人民转嫁战争负担，把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弄得民不聊生，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生活，宫闱之内丑闻百出，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他们对外欺凌弱小国家，却又惧怕强敌。一旦受到强秦的威胁，就赶忙打出投降主义旗帜，出卖盟友、割地求和；而对内则政治腐败、昏愤无能，甚至宠信奸佞，迫害忠良，嫉贤妒能，不一而足。诸如阴险毒辣的后妃郑袖（楚策四）、手段卑劣的阴谋家李园（楚策四）、昏庸残暴以至身死国灭的宋康王（宋卫策）、拒谏饰非、滥施刑罚的齐闵王（齐策六）、淫乱无耻的宣太后（秦策三）以及不辨贤愚的燕惠王（燕策二）等，都在《战国策》中得到了揭露和描绘，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憎恶。

《战国策》的绝大部分篇章是记载战国时的谋臣、策士、纵横家之类人物的言行和事迹的，着重表现了这些人士的才智和作用，这正是《战国策》不同于其他著作的独特之处。战国时代士人的出身成分是比较复杂的。有的出身于新兴地主阶级，有的出身于平民阶级，有的则来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以游说时君为仕进之路，其中那些被统治者接纳的，便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那些未被重用的，则往往贫困潦倒，与下层百姓为伍。登上政治舞台

的士人，常常凭借自身的才干成为叱咤风云、扭转局势、举足轻重的人物。有的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但有的也的确为所在之国作了好事和贡献。因此，对士人不能一概而论。虽然他们大多数人的从政动机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以致表现为朝秦暮楚、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寡廉鲜耻、缺乏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正义感，但其中也确有不少人既具有奇才异智和精辟的政治见解，又具有廉洁正直、傲视功名富贵、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高尚品质，成为被人民称颂的义士、高士、勇士或忠臣。虽然入仕的士人们都在复杂的斗争漩涡中驰骋，互相倾轧，党同伐异，互相辩难，纵横捭阖，甚至施展出种种阴谋和诡计，但由于具体情况和背景的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效果。《战国策》对于这些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了生动的记载和描述，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个特殊的时代，具体地分析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战国策》中还有一些篇章表现了倾慕正义、赞扬革新、倡导民主、歌颂反抗斗争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诸如冯谖、赵威后的民本思想；鲁仲连、王斗、颜闾的傲视王侯；荆轲、唐且的反抗强暴；孟尝君、燕昭王的礼贤下士；范雎、赵武灵王的积极革新；汗明、郭隗、莫敖子华关于人才问题